

Study on Confucian Classics and Thoughts

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

北京大學

《儒藏》

編纂中心

第一輯

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

(第一輯)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中心 編



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 第一輯/北京大學《儒藏》編纂中心編.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7-301-14406-0

I. 儒… II. 北… III. 儒家—文集 IV. B222.05-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167136 號

書名: 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第一輯)

著作責任者: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中心 編

責任編輯: 蕭 雪

封面設計: JUJF.COM 設計工作室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14406-0/B·0762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澱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網 址: <http://www.pup.cn>

電子郵箱: dianjiwenhua@163.com

電 話: 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65691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大學印刷廠

經 銷 者: 新華書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開本 34.5 印張 60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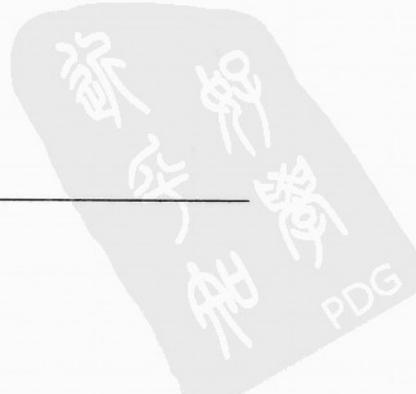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 86.00 元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舉報電話: 010-62752024

電子郵箱: fd@pup.pku.edu.cn



發 刊 辭

“儒藏編纂與研究”是 2003 年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重大課題攻關項目。其中有一個子項目，就是《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學術集刊。爲什麼我們要編輯這份學術集刊？這是由於當前我國社會和文化的發展，需要對“儒學”進行更加系統和深入的研究。

中華民族正處在偉大的民族復興路程之中，而民族的復興和民族文化的復興是分不開的。儒家自孔子起就自覺地繼承着夏、商、周三代的文化，從歷史上看，它曾是中華民族文化發育、成長的根。我們沒有可能把這個根子斬斷。如果我們人爲地把中華民族曾經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根子斬斷，那麼中華民族的復興就沒有可能了。因此，我們只能在傳承這個文化命脈的基礎上，適時地使之更新。就目前人類社會的現實情況看，在 21 世紀，“儒學”作爲一種精神文化，在中國、甚至在世界（特別是東亞地區）會有新的大發展。爲什麼儒學會有一個新的發展？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有經濟的原因，但與“西學”（主要指作爲精神文化的西方哲學等等）對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學）所進行的全方位的衝擊，有着密切的關係。正是由於“西學”對中國文化的衝擊，使我們得到了一個對自身文化傳統進行自我反省的機會。我們逐漸知道，在我們的傳統文化中應該發揚什麼和應該拋棄什麼，以及應該吸收什麼。因而，中國人長達一百多年的、對於“西學”的努力學習、吸收和消化，爲儒學從傳統走向現代奠定了基礎。

在新世紀，我們國家提出建設“和諧社會”的要求，而在我國傳統儒家思想中，正包含着“和諧社會”的理想，以及可以爲建設“和諧社會”提供的大量思想資源。《禮記·禮運》的“大同”思想，可以說是爲中華民族勾畫出的最爲重要的“和諧社會”藍圖。《易經》中的“太和”思想，經過歷代儒學思想家的發揮，已具有普遍和諧的意義，所以王夫之說“太和”是“和之至”。《論語》中的“禮之用，和爲

貴”、“和而不同”，《中庸》的“中和”以及朱熹對“中和”的解釋等等，為中國哲學提供了一種世界觀和思維方式。所有這些，都是我們今天建設“和諧社會”的有價值的資源。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曾提出“軸心時代”的觀念。他認為，在公元前500年前後，在古希臘、以色列、印度和中國，都出現了偉大的思想家。在古希臘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以色列有猶太教的先知，印度有釋迦牟尼，中國有孔子、老子等等，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傳統。這些文化起初並沒有互相影響，都是獨立發展起來的。這些文化傳統經過兩千多年的發展，在相互影響中已成為人類文明的共同精神財富。當今，世界各地的思想界出現了對“新軸心時代”的呼喚。這就要求我們更加重視對古代思想智慧的溫習與發掘，回顧我們文化發展的源頭，以響應世界文化發展的新局面。雅斯貝爾斯說：“人類一直靠軸心時代所產生的思考和創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飛躍都回顧這一時期，並被它重新點燃起火焰。自此以後，情況就是這樣。軸心期潛力的蘇醒和對軸心期潛力的回憶，或曰復興，總是提供了精神力量。對這一開端的復歸，是在中國、印度和西方不斷發生的事情。”例如，歐洲的文藝復興就是把其目光投向其文化的源頭古希臘，而使歐洲文明重新燃起新的光輝，並對世界產生重大影響。中國的宋明理學（新儒學）經歷了印度佛教文化的衝擊後，充分吸收和消化了佛教文化，“出入佛老，而返諸六經”，再次回歸先秦孔孟而把中國儒學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並對朝鮮半島、日本、越南的文化產生過重大影響。我們可以預見的是，在當今全球化的新形勢下，孔子的儒家文化作為“軸心文明”的重要一支，在長達百多年西方文化的衝擊下，將得以“蘇醒”，得以“復興”，以“和諧”的理念貢獻於我國“和諧社會”的建設和全人類“和諧世界”的建設。

由於儒學是歷史的產物，又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對它有種種不同的看法應說是很自然的。在今天全球化、現代化的時代，我們應該或能夠怎樣看待儒學？我認為也許可以從三個不同的角度來考察它：一是政統的儒學，二是道統的儒學，三是學統的儒學。

(1) 政統的儒學：儒學曾長期與中國歷代政治結合，它的“三綱六紀”無疑對專制統治起過重要作用。儒家特別重視道德教化，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對中國社會起着穩定的作用。但是，政統的儒學把道德教化的作用誇大，使中國重“人治”

而輕“法治”，而且很容易使政治道德化，從而美化政治統治；同時，它又使道德政治化，使道德成爲爲政治服務的工具。總的說來，政統的儒學面對當今的社會來說，存在着較多的問題。(2) 道統的儒學：任何一個成系統、有歷史傳承的學術派別，必有其傳統。西方是如此，中國也是如此。從中國歷史上看，儒、道、釋三家都有其傳統。儒家以傳承夏、商、周三代文化爲己任，並且對其他學術有着較多的包容性，他們主張“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但既成學派難免也會有排他性。因此，對“道統”的過分強調，就可能形成對其他學術文化的排斥，形成對異端思想的壓制。而歷史上某些異端思想的出現，恰恰是對主流思想的衝擊，甚至顛覆，從而爲新的思想發展開闢道路。(3) 學統的儒學：“學統的儒學”指的是儒家學術思想的傳統，包括它的世界觀、思維方法和對真、善、美境界的追求等等。儒學在這些方面可提供的有意義的資源較爲豐厚，應爲我們特別重視。基於此，當前乃至今後，對儒學不應政治意識形態化，學術最好歸學術。而且儒學應更具有“海納百川”的氣度，在與各種文化的廣泛對話中更新自己。

《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是一份學術性的刊物，當然要特別重視學統的儒學。對於應該如何從“學統”的角度來看儒學(當然，對其他學術文化的傳統也應如此看)，我有以下四點看法：(一) 要有文化上的主體意識。任何一個民族的生存與發展，都必須植根於自身的文化土壤之中。只有對自身文化有充分的理解與認識、保護和發揚，它才能適應自身社會合理、健康發展的要求，它才有吸收和消化其他民族文化的力量。一個沒有力量堅持自身文化自主性的民族，也就沒有力量吸收和融化其他民族的文化以豐富和發展其自身文化，它將或被消滅，或被同化。(二) 任何文化要在歷史長河中不斷發展，都必須不斷地吸收其他民族文化，在相互的交流與對話中，才能得到適時的發展和更新。羅素說得對：“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過去已經多次證明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里程碑。”在歷史上，中華文化有着吸收和融化外來印度佛教文化的寶貴經驗。這些經驗應該受到重視。在今天的全球化時代，面對西方的強勢文化，我們應更加善於吸收和融化西方文化和其他各民族的優秀文化，以使中華文化更具有世界意義。(三) 社會在不斷發展，思想文化在不斷更新，但古代思想家提出和思考的文化(哲學)問題，他們思想的智慧之光，並不因此就會過時。有些他們思考的問題和路子以及理念，可能是萬

古常新的。在雅斯貝爾斯的《大哲學家》一書中，他認為：在科學方法的運用上，我們可以說我們所處的時代超過了亞里士多德，但就哲學本身而言，我們很難再達到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水準。哲學歷史的某些發展是顯而易見的，但我們並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後代的哲學家就一定超過前代。（四）任何歷史上的思想體系，甚至現實存在的思想體系，沒有完全正確的。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絕對真理的學說。每一種學說都必然有其局限性，其體系往往包含着某些內在矛盾。即使其中具有普遍意義（價值）的精粹部分，也往往要給以合理的現代詮釋才行。恩格斯在《反杜林論草稿片斷》中說：“在黑格爾以後，體系說不可能再有了。十分明顯，世界構成一個統一的體系，即有聯繫的整體。但是對這個系統的認識，是以對整個自然界和歷史的認識為前提，而這一點是人們永遠達不到的。因而誰要想建立體系，誰就得用自己的虛構來填補無數空白，即是說，進行不合理的幻想，而成為觀念論者。”羅素在其《西方哲學史》中說：“不能自圓其說的哲學絕不會完全正確，但是自圓其說的哲學滿可以全盤錯誤。最富有結果的各派哲學向來包含着顯眼的自相矛盾，但是正為了這個緣故才部分正確。”我認為，這兩段話對我們研究思想文化都很有意義。因為任何思想文化都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不可能完全解決人類社會今天和明天的全部問題；就儒學來說，也是一樣的。正因為儒學是在歷史中的一種學說，才有歷代各種不同的詮釋和批評，而今後還會不斷出現新的詮釋，新的發展方向，新的批評，還會有儒家學者對其自身存在的內在矛盾的揭示。在人類社會進入全球化時代的今天，遵循我們老祖宗的古訓“日日新，又日新”，不斷反思儒學存在的問題（內在矛盾），不斷給儒學以新的詮釋，不斷發掘儒學真精神中所具有的普遍性意義和特有的理論價值，自覺地適時發展和更新其自身，才是儒學得以復興的關鍵。

由北京大學《儒藏》編纂中心編輯、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學術集刊，是開放性的學術刊物。我們歡迎海內外學者來稿，共建研究和討論“儒學”的家園。

湯一介

2008年10月25日

目 錄

發刊辭	湯一介 (1)
帛《易》與漢代今文《易》	劉大鈞 (1)
《尚書》學研究概況	呂文郁 (12)
關於近年來《詩經》研究的兩個問題	
——兼論《詩經》人文精神的現代價值	趙沛霖 (44)
三禮研究的大勢與問題	彭 林 (69)
《春秋》學研究的現狀及相關諸問題	趙伯雄 (79)
詮釋學的研究現狀及前景	景海峰 (87)
關於韓國儒學的報告	[韓]崔根德 (113)
1986—2006 年期間越南的儒教研究現狀與問題	[越]阮金山 (118)
《五經》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	[荷]施舟人 (134)
論儒家的“知行合一”	湯一介 (139)
東漢今古文學的變化、興衰與合流	陳蘇鎮 (149)
基於文獻學的經學史研究	[日]橋本秀美 (163)
“不安其用而樂其辭”	
——論帛書《易傳》“德義”視野下的易學詮釋方法	徐 強 (177)
胡瑗對程頤《易》學的啟發與影響	姜海軍 (193)
春秋時代的孔子形象	王豐先 (209)

從“賦《詩》斷章”到“通經致用”

——中國古代《詩》學傳統的形成探原…………… 馮一鳴 (234)

連續性與斷裂性

——試論清代考據學的理论前設…………… 張永奇 (256)

《論語義疏》的體式與結構及其詮釋學意義…………… 甘祥滿 (266)

邢昺《論語注疏》的注釋特色…………… 唐明貴 (291)

趙岐的《孟子章句》及其孟學思想…………… 李峻岫 (308)

版本再造的“得而復失”與“失而復得”

——以《中庸集解》、《中庸輯略》爲例…………… 嚴佐之 (324)

《穀梁》單疏本與注疏合刻本考…………… 張麗娟 (344)

孫奇逢《四書近指》編纂與刊刻考略…………… 谷 建 (366)

《鹽鐵論校注》校讀記…………… 楊 軍 (375)

《尚書正義》校點質疑…………… 周 粟 (381)

《儒藏》編纂學術談…………… 孫欽善 (401)

《儒藏總目》之編纂…………… 張玉範 沈乃文 (417)

古籍校點誤例辨正

——《儒藏》校點書稿審閱劄記…………… 張衍田 (433)

關於《儒藏》精華編《張載全集》編校的思考…………… 陳俊民 (484)

《儒藏》編纂隨劄

——目錄版本校勘六則…………… 李暢然 (498)

“他校”小議…………… 沙志利 (521)

編後記…………… (534)

徵稿啟事(附錄:撰稿體例)…………… (535)

帛《易》與漢代今文《易》

劉大鈞

【內容提要】 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作為漢初隸寫本，為學界進行漢初今、古文易學的研究打開了新的學術視野，為我們探索漢初今文《易》旨提供了寶貴的資料。我們考辨認定，帛書《周易》經傳是孔子及其弟子易學思想的反映，此隸字《易》本乃是漢初田何所傳之今文《易》本。我們以舉證的方式，通過今、帛本及竹書《易》學資料的比照，對漢代今文《易》作出了初步的求索、挖掘。與此同時，我們在出土和傳世《易》學資料的對比中，力求揭示出漢今文《易》旨在魏晉及唐初的一些傳承情況。

【關鍵詞】 帛書 《周易》 《易傳》 今文《易》

近年對最新出土的簡帛易學資料，學者們有熱烈的討論，特別對湖南馬王堆漢初帛書《周易》資料的討論與研究，自20世紀80年代初就已展開，至今已經歷20餘年，但人們的研究仍停留在對這些帛書《周易》資料的詁釋訓解及個別文字字義的辨析考證上，未能將此一漢初《周易》經傳隸書抄本的研究，納入對漢代今、古文經學研究的視野之內，並以此對這一漢初抄本作一番探流涉源的追索，從而探索久已失傳的漢人今文《易》旨，尋求並檢拾統治兩漢達四百年之久的漢人今文《易》遺義。

我們知道，1973年湖南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周易》六十四卦經文及傳文《二三子》、《繫辭》、《衷》、《要》、《繆和》、《昭力》諸篇，其最可貴之處，是它塵封兩千餘年，原封不動地保留了漢初隸寫今文本原貌，而經我們考辨認定：此隸字《易》本，正是漢初田何所傳之今文《易》本。

首先，以時間考之，如前所述，帛本寫定於漢初，而田何為漢初唯一傳《易》之人。《漢書·藝文志》說：“及秦燔書，而《易》為筮卜之書，傳者不絕。漢興，田何傳之。”特別是《漢書·儒林傳》稱：“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要言《易》者，本之田何。”所以，依《漢書·儒林傳》的說法，田何為漢初傳《易》第一人。《漢書·儒林傳》中還有一條重要線索：“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授東武王同子中、洛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據顏師古注：“高祖用婁敬之言徙關東大族，故何以舊齊田氏見徙也。初徙時未為杜陵，蓋史家本其地追言之也。”依此條顏注，我們可知，此所謂“漢興”者係指田何是於高祖時徙杜陵的，故“漢興，田何傳之”之“漢興”，自然亦是指高祖之時田何授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四人，也應在高祖之時。

其次，以學術歸屬考之，依據傳統說法，今本“十翼”諸篇為孔子所傳授，而帛書經文卦名及傳文多依“十翼”傳文訓讀，其中更有與今本《繫辭》基本相同的帛本《繫辭》，這就清楚地說明：帛書經文、傳文屬孔子所傳。而田何正是漢初孔門易學的傳人。

依據傳統說法，《彖》、《象》、《繫辭》、《說卦》、《文言》等解說《周易》古經的傳文係孔子所作，故《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同時，《史記》與《漢書》都列出了一份由孔子傳《易》直至西漢田何的師承關係傳授名單，由此可知，田何《易》確實師承於孔子，而這也正是田何《易》在武帝時能立為《易經》博士的根本原因。因此，考察帛《易》經文及傳文與孔子的關係，是確定它是否為田何傳本的重要依據：首先，帛《易》傳文各篇大量記載了孔子及其弟子的研《易》言論。由此可知，帛書《易傳》是孔子及其弟子《易》學思想的反映。其次，帛《易》經傳文中的卦名，多依《序卦》、《說卦》、《繫辭》等傳文訓釋，說明帛書傳文、經文皆當為孔門所傳之《易》。如：今本《睽》卦，竹書作“睽”，“睽”字很明顯與今本“睽”同。而帛本此卦作“乖”，帛本卦名作“乖”，顯然是得之《序卦》：“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可證帛本卦名作“乖”，是以《序卦》的訓釋為據。再如今本《履》卦，帛本作“禮”，此亦得

之《序卦》：“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由此知，今本《乾》卦帛本作“鍵”，今本《坤》卦帛本作“川”，亦皆得之《說卦》“乾，健也”、“坤，順也”。過去讀《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總不解先儒何以“天行健”對應“地勢坤”，見到帛本後方知，此“天行健”者，乃“天行鍵”也。因“鍵”、“健”互假，故而“天行健”即“天行鍵”，而“天行鍵”亦即“天行乾”也。《象》文是以“天行乾”對應“地勢坤”。以此可知，《象》文當經今文經師整理。今本《離》卦帛本作“羅”，亦本之《繫辭》：“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由帛本卦名多以《序卦》、《說卦》、《繫辭》等傳文之釋為據考之，帛本對原古文本中的古字古義，已經本着“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的精神作了訓詁解讀，因而留下了田何當時傳《易》時，“傳通其義”、“以今文讀之”的明顯印記。故帛本應為漢初田何今文本無疑也。

在我們確定了馬王堆帛書《易》經傳之文當為漢初今文《易》傳本之後，我們即可依此傳本而考察出一些久已失傳的今文《易》旨。這些今文《易》旨對今天我們研究兩漢今古文經學奧旨及其演化流變，有着極為重要的學術價值與史料價值。下面我們通過對今、帛本及竹書《易》學資料的比照，以舉證的方式來對漢代今文《易》作一求索、挖掘。

一、由諸本經文之比照求索漢代今文《易》

今本諸卦中之“无”字，如《乾》卦九三爻之“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之“无”，《釋文》釋“无”云：“《易》內皆作此字，《說文》云，奇字無也，通於无者，虛无道也。王述說天屈西北為无。”我們知道，孔子定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釋文》定“无”為“無”之奇字，奇字為六書之一，即古文而異者，亦應屬古文，但漢熹平石經定“无”字為今文，依石經之定，則今本《周易》經文所用“无”字乃是今文。帛本多亦作“无”，然亦有作“𠄎”者，如《損》卦卦辭即作“𠄎咎”。因竹書《乾》卦殘缺，但由其他卦之卦爻辭考之，今本之“无”，竹書皆作“亡”。亦可證其“无”為

今文。

今本《坤》卦之“坤”，帛本作“川”。案《釋文》釋“坤”字曰：“本又作𠄎。𠄎，今字也。”故今本作“坤”，是為古文。《釋文》釋《乾》卦曰：“《說卦》云：‘乾，健也。’”釋《坤》卦云：“《說卦》云：‘坤，順也’。”而《釋文》釋《震》、《坎》、《艮》、《巽》、《離》、《兌》諸卦皆未引《說卦》以釋之。《釋文》引《說卦》釋《乾》卦為“健”，故乾卦帛本作“鍵”，“鍵”即“健”也。《釋文》引《說卦》釋《坤》卦曰“順”，故《坤》卦帛本作“川”，“川”即“順”，案帛書《繆和》篇曰“川者，順也”是其證。漢人隸字多以“川”字為坤。《隸釋·孟郁修堯廟碑》洪适釋之曰：“其中乾川與穎川字相類。雖《家語》有乾川猶天淵也，然隸書未嘗有坤字，此乃乾坤爾！”洪氏所考是也。案《隸釋·成陽靈台碑》：“則乾川之象通。”《隸釋·張公神碑》：“乾剛川靈”，“乾川傳億萬兮”。再，《隸釋·三公山碑》：“分氣建立乾川，乾為物父，川為物母。”等，此例甚多，故今本之“坤”，是取古文，帛本作“川”，疑“川”即“𠄎”，是取今文隸字也。

《師》卦上六爻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今本“開國承家”，帛本作“啟國承家”，竹書作“啟邦丞豕”。由帛本、竹書此處皆作“啟”字考之，今本作“開”當為後人抄書者所改。《象》稱：“‘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此《象》作者所見《易》本作“邦”之確證也。帛本抄書者為避漢高祖劉邦之名諱，故改“邦”為“國”，今本抄書者為避漢景帝劉啟之名諱，又改“啟”為“開”。此亦可證今、帛本確為漢人所抄成也。故今本雖稱為古文本，實乃經漢人改動之抄本也。

《明夷》卦初九爻辭：“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垂其翼”，帛本作“垂𠄎左翼”，多一“左”字。案《明夷》卦六二爻作“明夷，夷于左股”，六四爻有“入于左腹”，其“股”、“腹”皆有“左”字，故其“翼”亦應有“左”，當依帛本作“垂𠄎左翼”為是。再，《詩·小雅·鴛鴦》：“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亦與帛本此爻相類。“夷”字，《釋文》：“亦作𠄎。”《玉篇》目部第四十八釋“𠄎”云：“古𠄎字。”據前文所考，知“𠄎”為古“夷”字，“𠄎”則為古“𠄎”字。

《益》卦六三爻辭：“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今本“益之用凶事”，帛本作“益之用工事”。古“工事”指土木建築及工藝之事，古人以為水利工程為工事之大。《周禮·天官冢宰·大府》：“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周禮·天官冢宰·大宰》：“‘五曰工事之式’者，謂百工巧作器物之法。”六四爻言“利用為依遷國”，此爻言“工事”，正與“遷國”相應。再，今本《隨》卦九四爻辭之“貞凶”，竹書亦作“貞工”，竹書作“貞工”，方合爻文“隨有獲”之旨而正可與初爻“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相應，故竹書此爻作“交叉工”，“交叉工”正應九四之“貞工”也。故《象傳》釋此爻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案“益用凶事”，何以能“固有之”？若依竹書及帛本經文，則《象傳》此爻應為“‘益用工事’，固有之也”，其義勝今本多矣。

《困》卦九四爻辭：“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竹書此爻亦殘缺，今本“來徐徐”，帛本作“來徐”。今由九五爻“乃徐有說”思之，此爻帛本作“來徐”恐非抄書者遺漏所致。考今、帛本六十四卦卦爻辭，凡言“來”而下文不重者，句式皆作“來×”，如《蹇》卦初六爻“往蹇，來譽”，九三爻“往蹇，來反”，六四爻“往蹇，來連”，上六爻“往蹇，來碩”，《豐》卦六五爻“來章，有慶譽，吉”，《兌》卦六三爻“來兌，凶”等；凡言“來”而下文重者，皆作“×來”，如《井》卦卦辭“往來井井”，《震》卦卦辭“震來虩虩”等。以此辨之，當以帛本作“來徐”為是，且該卦九五爻帛、今本皆作“乃徐有說”而未作“乃徐徐有說”，此亦可作此爻應作“來徐”之另一補證，今本作“來徐徐”恐是衍“徐”字。《象》文亦作“來徐徐”，當為後世抄書者增字作“徐徐”。《周禮·考工記·弓人》：“寬緩以茶。”鄭注：“茶，古文舒。”鄭玄以“茶”字為古文，作“舒”字為今文，而由《左傳》哀公十四年：“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史記·齊世家》作“庚辰田常執簡公於徐州”。《集解》：“《春秋》作舒州，賈逵曰：陳氏邑也。”《索隱》：“徐音舒，其字從人，左氏作舒。舒，陳氏邑。《說文》作郟。”《史記》所引作“徐”，知“徐”亦與“茶”互通。故《釋文》釋“來徐徐”曰：“徐徐，疑懼貌。馬云：安行貌。子夏作‘茶茶’，翟同。茶音圖，云內不定之意。王肅作‘余余’。”王肅作“余余”亦

即《說文》作“郟”也。故此爻作“徐”與子夏作“荼”、王肅作“余”、《說文》作“郟”其義皆同，諸字皆以從“余”而可互通也。

《旅》卦初六爻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今、帛本“旅瑣瑣”，竹書作“遮羸”。《說文》無“羸”字，且今、帛本“瑣”字重之作“瑣瑣”，而竹書只作“羸”，疑義或與“瑣瑣”不同。

今本“斯其所取災”之“災”，帛本作“火”，竹書作“懇”。案今本《豐》卦六五爻“有慶譽”，帛本作“有慶舉”，竹書作“有慶懇”，如以上下文意思之，今本作“譽”似不如帛本作“舉”於義更勝。古“譽”與“懇”及“輿”皆可通假，案《釋名·釋車》：“輿，舉也。”是其證。今本《旅》卦六五爻“終以譽命”，帛本作“冬以舉命”，竹書此爻殘缺。《象》釋此爻曰：“終以譽命，上逮也。”若以“上逮”釋之，則此字依帛本作“舉命”似於義更勝。“舉”與“譽”字以音形相近而可通假。考《戰國策·西周策·周君之秦》：“不如譽秦王之孝也。”而《史記·周本紀》引“譽”作“舉”是其證。故《豐》卦六五爻今本“慶譽”之“譽”，帛本亦作“舉”。故竹書此“懇”字應讀作“舉”。無論此字作“譽”作“舉”，其義皆與今、帛本作“災”作“火”不同。因竹書之“災”字作“𤇀”，如今本《无妄》卦六三爻“邑人之災”，竹書作“邑人之𤇀”；《小過》卦上六爻之“災眚”，竹書作“𤇀禴”，皆其證。案《釋名·釋天》釋“災”字曰：“火所燒滅之餘。”《玉篇》火部第三百二十三釋“災”字曰：“天火也，害也，又作𤇀。”《玉篇》並云“災”之古文作“𤇀”，“𤇀”即竹書“𤇀”字之異體。今本作“取災”，帛本作“取火”，當以帛本作“取火”得此爻之確義。理由有二：第一，今本《旅》卦六二爻“旅即次，懷其資”，九三爻“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上九爻“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其辭皆以韻讀，唯初爻不同，如依帛本作“火”，則“火”字正與上文“瑣”字協韻，以此而正合其餘爻辭之例。第二，“災”字本有“天火”“火所燒滅”之義，故九三爻稱“旅焚其次”，上九爻稱“鳥焚其巢”，其辭皆與火應，故《象》稱：“以‘旅’在‘上’，其義‘焚’也。”故由如上兩點考之，帛本作“火”，方得今本作“災”、竹書作“𤇀”之“天火”確義。

二、由今、帛本《易傳》之比照求索漢代今文《易》

帛書《易傳》作為漢初今文本，其對《周易》經文內涵的闡釋、發揮反映了漢初今文《易》的解經風格與理路，下面我們以《繆和》篇為例並比照“十翼”諸篇對漢代今文《易》旨作一探討。

帛書《繆和》：

繆和問於先生曰：請問《易·渙》之九二曰“渙賁亓階，每亡”，此辭吾甚疑焉，請問此之所謂……子曰：渙者，散也。賁階，幾也，時也。古之君子時福至則進取，時亡則以讓，夫時至而能既焉，散走亓時，唯恐失之。故當亓時而弗能用也，至於亓失之也，唯欲為人用，則可得也才（哉）？將何无每（悔）之又？受者昌，賁福而弗能蔽者窮，逆福者死。故亓在《詩》也曰：“女弄，不敝衣常；士弄，不敝車輪。”无千歲之國，无百歲之家，无十歲之能。夫福之於人也，既焉，不可得而賁也。故曰：賁福又央。聖人知福之難得而賁也，是以又矣。故《易》曰“渙賁亓階，每（悔）亡”，則□言於能賁亓時，悔之亡也。

我們看，在此段有關《渙》卦及其爻辭之義的解說中，“渙者，散也”，與《序卦》之說相同。案《序卦》：“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故《釋文》釋《渙》卦曰：“散也。”可證《釋文》依《序卦》而尚知《渙》卦之古義。而其解爻辭“賁階，幾也，時也”之旨，已於《釋文》、《集解》諸書中皆不可見，其就此旨而展開的高論：“古之君子時福至則進取，時亡則以讓，夫時至而能既焉，散走亓時，唯恐失之。故當亓時而弗能用也，至於亓失之也，唯欲為人用，則可得也才（哉）？將何无每（悔）之又？”等等，則更不見其義之傳矣。所謂“賁階，幾也，時也”之“幾”，今本《繫辭》中有解：“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以此而知“賁階”之旨在“成天下之務”。今本《文

言》又曰：“知至至之，可與言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故惟能“知至”而“至之”，才會“時福至則進取，時亡則以讓。夫時至而能既焉。”帛書此“至也”之“至”旨如此，而此“時也”之“時”亦與今本《象》釋《損》卦“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釋《蒙》卦“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其旨相合。故帛書釋此爻“進取”與“以讓”，皆須“與時偕行”。而由“至於元失之也，唯欲爲人用，豈可得也才（哉）？將何无每（悔）之又”可知，爻辭之所以曰“悔亡”者，其要在未失其“幾也，時也”。如若“失之”，則“將何无每（悔）之又？”正是鑒於對“幾也，時也”有着如此深刻的理解，故而才會說出深具哲理的“无千歲之國，无百歲之家，无十歲之能”的名言。而所有這些《易》文奧旨，若非帛本出土，今人何以知之？《象》釋《渙》卦：“渙奔其機，得願也。”由帛書之解得知此爻之所以“悔亡”者，其要在於未失“幾也，時也”，從而達到了“時福至則進取”的目的，故《象》文以“得願”釋之。因今文《易》義的失傳，後人已多不解《象》文何以於此曰“得願”。而虞翻以“動而得位”釋“得願”，恐已失漢初今文《易》之旨矣！

今本《蒙》卦卦辭之“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繆和》篇則引作：

“初筮吉”者，聞元始而知元終，見元本而知元[末，故]曰“初筮吉”。“再參瀆，瀆即不吉”者，反覆問之而“瀆”，“瀆”弗敬，故曰“不吉”。弗知而好學，身之賴也，故曰“利[貞]”。君子於仁義之道也，雖弗身能，剗能已才（哉）？日夜不休，終身不卷，日日載載必成而后止，故《易》曰：“蒙，亨，非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吉，再參瀆，瀆即不吉，利貞。”此之胃也。

今本“初筮告”之“告”字，帛本作“吉”，且《繆和》篇通篇皆以“吉”字釋之。《釋文》、《集解》皆未言“告”字先儒有作“吉”字者。且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文，亦僅發現時有脫去“无咎”、“悔亡”者，未發現《蒙》卦此“告”字作“吉”字者。故今本此“告”字，帛本作“吉”字是否是帛本抄書者的失誤呢？筆者曾以爲是帛本抄書者誤抄“告”字爲